

《零》:后“9·11”美国的忧郁与哀悼

池慧仪,杨金才

(南京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摘要:杰斯·沃尔特的《零》聚焦后“9·11”美国的集体哀悼问题,不仅讽刺再现了当时美国社会的忧郁图景以反思集体哀悼的政治、伦理实践,更展望了一种批判性的历史哀悼。两种关于丧失的主要叙事——关于“丧失”的理想话语与电视媒体的奇观哀悼——界定了媒介化的主流哀悼,并生产忧郁的主体以服务例外状态和商业主义。在话语表象宰制下,忧郁个体无法理性反思“丧失”并遗忘了本真的情感体验。然而自我具有抵制权力的潜能,废墟“零”敞开了去媒介化的历史哀悼可能,即通过想象与记忆感知本真的情感,并从历史维度审视被遗忘的暴力瞬间。

关键词:《零》;杰斯·沃尔特;哀悼;忧郁;废墟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0)03-0068-07

当代美国作家杰斯·沃尔特(Jess Walter 1965-)以其荒诞幽默的小说风格与深切的政治关照备受文坛瞩目,其代表作《零》(*The Zero*)曾入围2006年美国国家图书奖短名单。小说讲述了“9·11”恐怖袭击之后,美国社会不仅深陷创伤悲痛,而且面临“越反越恐”的局面:为调查恐怖组织,政府自导自演恐怖袭击,最终导致地铁爆炸案和数名阿拉伯裔警方卧底身亡。沃尔特在谈及《零》的创作时曾坦言,美国社会将悲剧打造成“胜利神话”,这恰恰成了恐怖主义的“同谋”,制造了更多暴力^①。事实上,美国政府在袭击发生10天之后就主张停止哀悼,以军事打击取代悲伤。巴特勒(Judith Butler)就此发表看法,认为正是限制公开哀悼的指令才使得部分人成为不“值得哀悼的生命”^②,助长了现实的暴力。这种“失败的哀悼”^③值得深入思考,创伤之后人们应

该如何反思政治生活和社会历史?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直言,人们不应止步于悲伤,而应当清算每一个死亡事件:“……去思考,判断,去评价,甚至去估算,列举和计算。”^④后“9·11”的哀悼,对个体来说意味着理性思考这一“死亡事件”,从而生成批判的政治心灵;而对于社会则需要拓展关于“失去”的公共讨论空间,重新评估政治与伦理实践。

然而,沃尔特对后“9·11”美国哀悼政治的讽刺书写发人深省。人们仿佛陷入一场“高烧不退的梦魇”^⑤,丧失了清醒认知的能力,落入“越反越恐”的怪圈。已有不少学者就《零》中的哀悼政治展开讨论,比如道奇(Jason Dodge)认为小说凸显了集体哀悼背后的共情无能与资本操纵问题^⑥,巴尼塔(Georgiana Banita)则指出作者批判

收稿日期:2019-12-16

作者简介:池慧仪(1996—),女,广东广州人,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①Walter, Jess. “A Conversation with Jess Walter”,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20 Aug. 2019. <<https://b0f646cfbd7462424f7af9758a43fb7c33cc8adda0fd36101899.ssl.cf2.rackcdn.com/reading-guides/RG-9780061189432.pdf>>

②朱迪斯·巴特勒:《脆弱不安的生命——哀悼与暴力的力量》,何磊、赵英男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9页。

③Gray, Richard. *After the Fall: American Literature Since 9/11*. London: Wiley-Blackwell, 2011, p. 8.

④帕斯卡-安妮·布劳特、迈克尔·纳斯:《清算死者:雅克·德里达的哀悼政治学》,陆汉臻译,《生产——第八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33页。

⑤Walter, Jess. *The Zero*.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6, p. 101.

⑥Dodge, Jason J. “September 11 and Public Grief: Grieving Otherwise in Jess Walter’s *The Zero*”, *Critique: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Fiction*, 2014 (2): 151-165.

了美国社会对历史创伤的浅薄无知^①。尽管如此,学者们却忽视了废墟“零”的哀悼意义。在后“9·11”的美国,“举国上下的忧郁情绪都得服膺于特定的视听框架”^②,在媒体主导的哀悼文化之外,与废墟遭遇的个体却得以经历另一种超越性的体验——去媒介化的历史哀悼。《零》展现了后“9·11”美国社会的忧郁图景,两种关于丧失的主要叙事——对“丧失”的理想话语建构与电视媒体的奇观哀悼——界定了媒介化的主流哀悼,并不断生产忧郁的主体以服务于例外状态和资本扩张。因此,忧郁的个体服从于话语建构的表象,不仅无法理性反思“丧失”,还逐渐遗忘了本真的情感体验。然而自我蕴含着反抗权力的能量,废墟“零”敞开了去媒介化的历史哀悼可能,即通过想象与记忆感知本真的情感,并从历史维度审视被遗忘的暴力瞬间。

一 生产忧郁:两种“丧失”叙事

忧郁与哀悼作为两种创伤性的体验,都是对“丧失”的反应,包括失去所爱的人或物,某种抽象物比如国家、自由或者理想。前者不断损耗自身,“对外在世界不感兴趣,丧失爱的能力”^③。而后者需要一定时间将力比多从原先依恋的对象中回撤并投射到新的客体之上,寻求修通的可能。忧郁的个体受到“良心”的批判与贬斥而自我损耗,这一机制正是精神吸纳社会管制的表现,显露出对权力的服从轨迹。但当个体步入哀悼阶段,接受“有所失”的现实并试图澄明“所失为何”,也清扫出一片心灵空地来反思权力话语以及“人与人之间最根本的相互依存状态和伦理责任”^④。“9·11”袭击之后,在布什当局与主流媒体对“正义之战”的鼓噪下,美国社会陷入了“普遍的忧郁症”^⑤。这种忧郁心态认同并夸大美国的损失,拒

绝对“9·11”袭击以及反恐政策进行理性的历史反思,更遑论哀悼反恐行动中他国受害的无辜平民。这一忧郁症候在《零》中得到了形象展示。对“失去”的理想化话语建构与电视媒体主导的奇观化哀悼,这两种关于丧失的主流叙事生产忧郁的主体以促进例外状态下的主权决断与资本扩张,塑造了媒介化的主流哀悼文化,它召唤着共情而非异质的讨论空间。缺乏对丧失的辩证思考,主体无法在忧郁的基础上步入哀悼阶段,也无从明白恐怖袭击后美国社会以及个人真正失去了什么。

“在哀悼中,没有什么与丧失有关的东西是无意识的”^⑥,但在忧郁者的心灵空间里“失去”是一片真空,人们只知道丧失发生了却不知道失去了什么。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指出,“忧郁是在客体丧失之前便意欲哀悼”^⑦,仍然拥有的时候提前哀悼,否定客体的存在使其成为在场的不在场。一方面,对失去亲朋的民众来说,丧失确实发生了;另一方面,未来向当下倒伏,预期的丧失成为忧郁者哀悼的对象。“心灵创伤是由将来产生的,由未来,由即将来临的最坏的威胁产生的”^⑧。恐怖分子隐没在人群中,危机如幽灵一般萦绕心头,警告着幸存者可能的丧失。另外人们还提前哀悼理想化的抽象物,比如英雄、国家、民主、经济霸权等,而这些实质上是话语建构的产物。有学者基于美国政府关于恐怖袭击与反恐战争的话术,认为后“9·11”主流舆论生产具有爱国主义集体人格的忧郁主体,具有“忧郁修辞”的特点^⑨。丧失“直接转化为高涨的良心”,它是“社会谴责的折射”^⑩,虽然无法清楚意识到失去了什么,个体以社会价值判断进行自我规范,服从主流的爱国主义逻辑。作者借小说中纽约市长“头

① Banita, Georgiana. *Plotting Justice: Narrative Ethics and Literary Culture after 9/11*. Lond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12, p. 5.

② 朱迪斯·巴特勒:《脆弱不安的生命——哀悼与暴力的力量》,何磊、赵英男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36页。

③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哀悼与忧郁症》,马元龙译,《生产——第八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页。

④ 朱迪斯·巴特勒:《脆弱不安的生命——哀悼与暴力的力量》,何磊、赵英男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3页。

⑤ 朱迪斯·巴特勒:《脆弱不安的生命——哀悼与暴力的力量》,何磊、赵英男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58页。

⑥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哀悼与忧郁症》,马元龙译,《生产——第八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页。

⑦ Agamben, Giorgio. *Stanzas: Word and Phantasm in Western Culture*. Ronald L. Martinez, trans.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3, p. 20.

⑧ 博拉朵莉:《恐怖时代的哲学:与哈贝马斯和德里达对话》,王志宏译,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103页。

⑨ Biesecker, Barbara. “No Time for Mourning: The Rhetorical Production of the Melancholic Citizen-Subject in the War on Terror”, *Philosophy & Rhetoric*, 2007(1): 147-169.

⑩ 朱迪斯·巴特勒:《心灵的诞生:忧郁、矛盾、愤怒》,何磊译,《生产——第八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71—72页。

儿”和“总统”之口讽刺再现了后“9·11”的官方话语,“他们痛恨我们的自由…我们繁荣的经济。这是一场女士们先生们慷慨解囊…在广场酒店畅饮回击的战争”^①。在官方话语里人们成了战士与光荣的消费者,前者坚定捍卫美国政府例外状态下的主权决断,后者则为国家输送金钱血液,支持商业主义的资本扩张。警察雷米(Remy)对于反恐调查全面服从,无法停下来思考。妮可(Nicole)则认为“9·11”之后应该大力发展房地产,捍卫美国经济霸权。他们展示了爱国集体人格的不同侧面,这些忧郁者为想象中的丧失提前哀悼,却不明白在集体话语之外自己究竟失去了什么。

吊诡的是,也许人们集体哀悼的不是拥有又将失去的客体,而是“缺乏”。齐泽克(Slavoj Žižek)直言,忧郁实际上是“将失去与缺乏混淆起来”^②。当缺乏成了失去,人们便欺骗性地拥有了它。在老警官阿迪契(Addich)的回忆中,六七十年代的纽约一片混乱,充斥着种族暴力与血腥镇压。而恐怖袭击之后,美国进入紧急状态,以正义之名的反恐行动却再现了种族暴力的历史悲剧。政府与主流媒体主张的民主与平等是否只是理想化的缺乏,只是想象而非现实?沃尔特在《零》中给出了悲观的解读。情报部门将伊斯兰群体视为重点怀疑对象,不惜让他们模仿圣战分子以刺激疑犯,最终引发了地铁恐袭。这出悲剧讽刺再现了后“9·11”美国对穆斯林群体的种族歧视,这种暴力往往以反恐为借口戕害伊斯兰他者。此外,情报部门无孔不入的实时监控使得个人隐私岌岌可危,这也令人反思恐怖时代民主与自由的意义。

在政府话语中,“失去”被政治化为抽象的理想,而电视等媒体对“失去”重复的创伤式再现则进一步推动严肃的公共哀悼。“‘9·11’事件从一开始就是媒介化的”^③,媒体的全面报道让人们从不同角度观看这事件。从重复播放的飞机撞击

大楼画面,归零地废墟到政府发言,都是在以语言、影像对创伤进行转码,试图将这一实在界的暴力体验纳入象征世界的规范中。另外纽约时报的“悲伤肖像”专栏则具象化丧失为一个面孔和故事,制造哀悼的公共场域。政府与电视媒体等主流舆论关于丧失的叙事通过复现创伤,要求大众的集体见证与哀悼。正如卡鲁斯(Cathy Caruth)所言,创伤并不是静态的结果,而是叙事化的过程,它讲述一种噩梦般的情境——在超越快乐原则的一次次强制重复中敞开伤口——并要求他者倾听与见证^④。

除了强制性重复的宏大叙事,媒体对私人哀悼的猎奇再现体现了另一种后“9·11”丧失的叙事结构。前者以理想化的建构号召超越个人的集体行动,后者则以对个人悲痛奇观式报道指向消解政治的娱乐窥淫。“失去”不仅在新闻中具象化,还进一步被戏剧化,成为后“9·11”媒体奇观的重要部分。这构成了界定人们认知的视听框架的另一维度,即商业主义的娱乐倾向。而媒体奇观作为“那些能体现当代社会基本价值观、引导个人适应现代生活方式、并将当代社会中的冲突和解决方式戏剧化的媒体文化现象”^⑤,背后是政治权力与商业利益的操纵。

在《零》中公众哀悼已然变成后“9·11”媒体奇观的一部分,忧郁者对丧失物的纠结、哀恸在媒体的精心编排下变成吸引眼球的故事。人们则是看客和不自知的演员。“景观就是商品完全成功的殖民化社会生活的时刻”^⑥,哀悼场景在媒体的包装之下成为商品。“每个人都为摄影师和电视镜头摆好姿势,比赛一般地展现悲伤与愤怒。”^⑦幸存者的实地见闻意味着绝好的商机,能开发出各种各样的娱乐项目。后“9·11”的美国社会并未笼罩在一片沉痛的肃穆中,反而迎来了媒体奇观的大爆炸与电视行业的繁荣发展。“历史已经成了惊悚片”,而电视行业正“囤积材料”为进一步的资本扩张做好准备^⑧。至于人们究竟哀悼的

①Walter, Jess. *The Zero*.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6, p. 51.

②斯拉沃热·齐泽克:《有人说过极权主义吗》,宋文伟、侯萍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09页。

③Schechner, Richard. “9/11 as Avant-Garde Art”, *PMLA*, 2009 (5): 1820-1829.

④Caruth, Cathy. *Unclaimed Experience: Trauma, Narrative and Histor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4.

⑤道格拉斯·凯尔纳:《媒体奇观——当代美国社会文化透视》,史安斌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版,第2页。

⑥居伊·德波:《景观社会》,王昭风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页。

⑦Walter, Jess. *The Zero*.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6, p. 36.

⑧Walter, Jess. *The Zero*.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6, p. 150.

是什么,为何哀悼,这些问题无法在奇观中得到解答。美军大肆轰炸伊拉克、阿富汗等国平民的时候,大众却沉湎于娱乐景观,很少有人思考这场“正义之战”是否是正义的。人们满足于不断变换的表象,丧失了停下来思考的动力与积极参与的政治潜能。

二 哀悼困境:话语下的认同与反抗

然而忧郁与哀悼并非截然对立,当个体接受现实裁决,开始思考“所失为何”,悲伤便具有了积极的政治潜力。哀悼即是清算死亡的伦理责任,试图厘清“失去”是什么。关于丧失的叙事不只是回溯过去,也是对未来的想象:“对丧失的恐惧与依恋及其幻想绝不是简单地居于过去,因为正是对丧失的叙事化过程才会对未来产生一种脉动。”^①但是,《零》中关于丧失的两种叙事却导向失败的哀悼,在忧郁闭环中重复着梦魇。尽管如此,处于哀悼困境的主体并非全然受制于话语建构,而具有反抗的可能。主人公雷米的哀悼困境正是对理想化话语下个体的讽刺写照,而忧郁的自我却潜伏着抵制权力的能量。他对于伊斯兰他者的哀悼不仅是伦理关照,更是对例外状态的理性反思。

体味丧失的过程中,不同生命的可哀悼性也渐次显露。在后“9·11”美国主流话语中,带有伊斯兰世界印记的他者是不值得哀悼的生命。秘密反恐计划导致几名阿拉伯裔警方卧底惨死,但在媒体的报道中,事实被篡改成了警方成功破获恐怖组织并阻止了其进一步的袭击。在主流视听框架下,关于暴行的话语缺位正标识了一种社会拒斥机制。他们的社会存在被否认,也就“通过某种先发制人的遗失构成了主体”^②更威胁着主体,因为它无法为自我审查的“良心”所承认与思考。“主体既非完全由权力决定,也不能完全决定权力”^③,被权力生产的忧郁主体对权力的重申并非是既定的直线,而是不时偏离的曲线,这种抵制力量有可能消解忧郁状态,促进良性的哀悼,也

就是试图理解那些被噤声的丧失。

恐怖袭击之后,雷米变得间歇性失忆。暂时失忆时,他便成了“第一个雷米”,执行排查恐怖分子的任务。而“第二个雷米”则对整个计划毫不知情。他陷入了哀悼的困境,既受官方话语煽动参与反恐,又为被警方控制的数名阿拉伯人感到悲哀。雷米意识到他们的生命不仅被褫夺,更在例外状态的行动逻辑下是被否认的社会存在。这提醒着忧郁主体对他者的伦理关怀,雷米在纸上写下“长大”与“不要伤害任何人”^④,释放了反抗甚至消解例外状态这一宏大话语的潜力。从一味服从,到以行动来打破沉默,曾经屈从于话语建构的主体开始寻求自身以及忧郁机制的解体。

然而,正如书名“零”所指,所有努力都汇成虚无,雷米的反抗最终成了更高效的服从。他希望和艾普尔(April)一起逃离警方控制,却发现这只是自己之前布下的卧底计划……沃尔特在采访中直言:“我希望布莱恩·雷米成为被胁迫的英雄,无论是对自己的行为还是对他人的意图都处于全面蒙蔽中。”^⑤然而虚无主义绝非小说的宗旨,其困境说明面向他者的哀悼有着积极的伦理意义,但是主流话语依然强大的情况下,静观沉思也许才能寻觅真实图景,“他也许永远也不知道自己是否做了正确的事情……却知道自己做了错误的事情”^⑥。

如果说唯我的忧郁症是哀悼无能,遗忘原初的创伤经验也同样是失败的哀悼。景观的本质是认同性的,它隐性引导着人们的欲望,戏剧化的哀悼表象遮蔽了人们对“9·11”事件本真的情感体验。媒体对“失去”奇观化的脱敏复现并未使创伤得到修通,反而加强忧郁者的自我戕害。而为了摆脱自我销蚀,主体在纷繁的媒体景观中沦为被动的看客,逐渐遗忘本真的情感体验乃至抛弃身份,失去本体。

得知亲人死讯后,艾普尔陷入了无边痛苦,但她的故事却成了一场电视真人秀。节目围绕“失

①伍德尧,大卫·卡赞坚:《哀悼残存》,李书仑译,《生产——第八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99页。

②朱迪斯·巴特勒:《权力的精神生活:服从的理论》,张生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页。

③朱迪斯·巴特勒:《权力的精神生活:服从的理论》,张生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页。

④Walter, Jess. *The Zero*.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6, p. 190.

⑤Walter, Jess. “A Conversation with Jess Walter”,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20 Aug. 2019. <<https://b0f646cfbd7462424f7af9758a43fb7c33cc8adda0fd36101899.ssl.cf2.rackcdn.com/reading-guides/RG-9780061189432.pdf>>

⑥Walter, Jess. *The Zero*.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6, p. 299.

去”发散一系列情感并对其放大,以精心安排的剧本、大量的剪辑搭建哀悼的场景。但是这种对丧失的再现最多只能达到脱敏效果,却无法使创伤得到修通,反而令她在忧郁中越陷越深,无法走出痛苦。

艾普尔曾幻想过一个全民默哀的后“9·11”社会,甚至不再发行报纸。然而在哀悼奇观的全面渗透下,她选择主动遗忘,以变幻的媒体景观取代痛苦的现实。乃至抛弃自我,成为奇观的奴隶。她希望在旧金山开始一种匿名的生存。家可以是任何地方,酒店客房就可以满足她的所有需求,而电视就是认识世界的眼睛。媒介化的现实呈现为“一个自主自足的影像世界”^①,少数人表演,而大多数人沉醉地观赏。然而在后“9·11”时代,这样被动的“看”却值得深思。对雷米而言,凝视袭击留下的废墟“零”,“丧失显得更加私人化,也不那么矫揉造作”^②,媒体哀悼图景的人为性、奇观性方才突显出来。当人们只通过电视、互联网等媒体来进行媒介化认识,其对“9·11”事件原初的情感体验也被遮蔽了。不过这种体验对艾普尔来说却是生命不可承受之“重”,遗忘或许能带来轻盈的生存,只是这种“轻”带来的是迷失的虚无。“关于现实的片断的景色,只能展现为一个纯粹静观的(contemplation)、孤立的(seule)伪世界。”^③媒体景观似乎为忧郁个体提供了逃离现实的出口,“从悲伤到滑稽再到哀怜,这些细微的裂隙引导着人们的情绪”^④。在悲伤袭来之时,艾普尔便病态地不断换台,用闪烁的屏幕上光怪陆离的现实填满自己。在媒体奇观的狂轰滥炸下,她早已抛弃了本体。

三 直面废墟:对“残存”的历史哀悼

无论是宏大政治叙事,还是对哀悼的猎奇再现,小说中的两种后“9·11”丧失叙事推进的是一种媒介化的哀悼。雷米与艾普尔的困境表明,这样的哀悼停留在共时的层面,理想化的话语建

构要求当下的政治服从,而哀悼奇观诱导人们放弃理性思考。忧郁个体对表象的服从令人思考:“失去”能否开启批判的思维空间?怎样的哀悼才是生产性的?

而“残存”提供了理解丧失的不同维度,“只有通过残存及其生产,及对它的解读和维护才能了解丧失”^⑤。对残存的哀悼连接起时间与空间上的在场与不在场,发起一场生者与死者、现在与过去、记忆与遗忘之间的对话。这样的对话也许带来的是倒退的一味怀旧,却也可能是“一次突现、一个紧急的顷刻,最重要的是一个生产的瞬间”^⑥。这种肃穆的沉思给予残存持续的关注,从而开放地思考历史。在后“9·11”时代着眼于残存,也就是重返废墟,进行一种去媒介化的历史哀悼。废墟唤起哀悼的忧郁精神,它不是拒绝承认、反思的滞后思维,而是出于对丧失的挚爱,一步一步回头的历史凝望。作为物化的历史,废墟集非人化的垃圾意象与自然化的生命意象于一体,给予观者审美化的创伤体验。其独特的时空在场弥散“灵晕”,使观者得以对“9·11”进行一种有距离的去媒介化哀悼。

小说中的“零”并不是空泛的创伤符号,它有着现实的对应物——“9·11”归零地。“零”首先是可怖的,无论是堆叠的残骸,还是幽深的巨坑,它以其死寂、冰冷的现实宣告丧失已然发生,令人触目惊心,“很难想象胜利不属于他们(恐怖分子)”^⑦。它非人化的特征意味着一种去共情的语言空缺,似乎“零”是不可说、不可想象的神秘禁地。面对废墟里不时露出的人体碎片,雷米陷入了痛苦的沉默。

然而沃尔特也给予废墟温柔的注视,“零”也是美丽而脆弱的,在可怕的、非人化景象之下潜伏着诗性的生命张力。对废墟的审美再现中,它不是无意义的垃圾,而成为一种生命意象,在想象中幻化成了自然界的有机组成部分。“深坑”似要吞没一切的虚无,却也是“缓慢燃烧的钢铁森林

①居伊·德波:《景观社会》,王昭风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②Walter, Jess. *The Zero*.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6, p. 36.

③居伊·德波:《景观社会》,王昭风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④Walter, Jess. *The Zero*.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6, p. 240.

⑤伍德尧、大卫·卡赞坚:《哀悼残存》,李书仑译,《生产——第八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89页。

⑥伍德尧、大卫·卡赞坚:《哀悼残存》,李书仑译,《生产——第八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88页。

⑦Walter, Jess. *The Zero*.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6, p. 19. 括号内容为笔者补充。

环抱着的高山湖”^①。废墟也是牧场,挖掘机如“黄色的钢铁马儿”,“等待着获准啃咬废墟”^②。死亡与毁灭在联想中进入了更广大的生命循环。钢铁不再坚不可摧,像是露天腐烂的鲸鱼,裸露着骨骼,进入自然的物质循环。废墟中的人体部分和纸张在时间和风的作用下逐渐消失,如同蒲公英的种子四处飘散。借由这一比喻,必然走向衰败的残存也具有了新生的力量。废墟在想象中不断生成意义,展开了有其内部物质循环的自然图景。残存提醒着人们丧失已经发生,但作者抒情的描写说明,创伤带来的除了恐惧与麻木,也可能是对死亡的美学感知。

因此,废墟唤起的是观者本真的情感体验。这种体验由哀悼赋予,个体沐浴在废墟的“灵晕”中,感应其在场并通过想象将其内化。借由这种有距离的去媒介化哀悼,个体脱离了媒体景观的控制,主动地感知与理解丧失。这种哀悼既是审美的,产生对死亡的美学想象,也是伦理的,见证他者创伤。“零”保留着“9·11”的痕迹,它的“灵晕”^③,也就是“此时此刻——它独一无二的诞生地”^④,制造了“主体和客体、观察者和被观察者之间的一种引力(力场)”^⑤。因此面对实体的废墟,主体得以摆脱对媒体景观被动的观看状态,主动感知不同时空。但这一时空作为“一定距离外的独一无二显现——无论它(事物)有多近”^⑥,永远与观者保持着距离,只能在想象与记忆中趋近。置身于废墟之中,个体就进入了私人记忆与宏大历史交织的时空。残存维系着关于丧失的记忆与情感,满目疮痍的景象就像“记忆中的明信片”,唤起了雷米一度试图抹去的沉重记忆。除了不断充盈的记忆空间,废墟还提供了见证的可能。丧

失无法复原,残存却激起了哀悼者想象与理解的努力。雷米对陌生的死难者生发出想象与共情,努力进行不可能的见证。一件落满灰尘的毛衣就能勾画出某个女子的生命片段。在静默中,生者似乎触摸到了真实的历史。

悼念废墟生发的不只是审美、伦理的情感体验,还有历史的思考。“零”并不是孤立的哀悼对象,而是更大的历史图景的一角,闪现了早已被遗忘的历史片段。历史哀悼从来不是心血来潮或对创伤的滞后沉湎,而是对历史中复数的废墟予以审视,反思制造废墟的那股野蛮力量。“裂隙影响着所有人,这是他们共有的文化病症。”^⑦这是一种历史健忘症,在宏大的政治共识与媒体景观的统治下,“9·11”这道裂隙被简化为独属于美国人的创伤,人们逐渐失去对事件本真的情感体验和理性思考。正如格雷所说,“失败的哀悼遗留下一个敞开的伤口,它是国家精神生活的一道裂隙或空缺——归零地就是其运作符号。”^⑧历史是可疑的,“你相信什么? 记忆? 历史? 不,这些只是故事,我们自己选择的故事——关于我们的婚姻,关于柏林墙——裂隙无处不在”^⑨。然而后“9·11”社会依然延续着过去的生活方式,人们高谈进步,继续为文明、民主等宏大理想疯狂,在历史的旋风中疾步前进。

这是一场本雅明所说的进步的风暴,它是一种破坏的力量,遗忘的力量。“历史天使”看到的历史是“一场单一的灾难”,是从未结束的废墟堆叠,“这风暴无可抗拒地把天使刮向他背对着的未来,而他面前的断壁残垣却越堆越高直逼天际”^⑩。历史并非均质、同一的连续体而是一个巨大的“归零地”。废墟显露的是“虚空”与“永

①Walter, Jess. *The Zero*.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6, p. 20.

②Walter, Jess. *The Zero*.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6, p. 37.

③“灵晕”(Aura)概念定义复杂且模糊,据考,Aura是德语文献中的常见词汇,尤指教堂圣像中的“光晕”,并且沃尔夫斯凯尔(Karl Wolfskehl)早于本雅明将灵晕解释为普遍的体验,“每一种物质形态都散发着光晕”。本雅明在转义层面上将“灵晕”发展成其美学思想中心概念之一,与艺术品的“本真性”,“膜拜价值”与“距离感”相联系。但他也指出“所有事物都能显现真正的光晕”。见方维规:《本雅明“光晕”概念考释》,《社会科学论坛》2008年第9期。

④瓦尔特·本雅明:《经验与贫乏》,王炳君、杨劲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62页。

⑤瓦尔特·本雅明:《经验与贫乏》,王炳君、杨劲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65页。

⑥瓦尔特·本雅明:《经验与贫乏》,王炳君、杨劲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65页。

⑦Walter, Jess. *The Zero*.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6, p. 264.

⑧Gray, Richard. *After the Fall: American Literature Since 9/11*. London: Wiley-Blackwell, 2011, p. 9.

⑨Walter, Jess. *The Zero*.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6, p. 160.

⑩瓦尔特·本雅明:《启迪:本雅明文选》,张旭东、王斑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270页。

恒”^①,是暴力与创伤不断重演又不断被遗忘的循环。“没有一座文明的丰碑不同时也是一份野蛮暴力的实录”^②,在进步的名义下创伤终会被治愈,暴力将得到严惩,但老警官阿迪契的回忆揭露了国家自我戕害的过去与废墟般的历史。“9·11”事件遇难人数逾三千,但在纽约暴乱的六七十年代,“一年内自相残杀的人数就有那么多”^③。可以说废墟“零”就是美国的缩影,一个巨大的“垃圾场”^④,见证又掩埋了形形色色的罪恶。暴力和创伤总是卷土重来,而后“9·11”时代的人们以其失败的哀悼默许了这一循环。“零”被清理干净,重新归化到进步的现实中,在商业化的大潮中成了旅游景点与房产开发区,“一切都会消逝”^⑤,废墟最终丧失了灵晕。但是,其中闪现的历史瞬间开启了主体新的存在,对残存的记忆与想象也不失为抵抗遗忘的可贵努力。

结语

《零》中的美国为后“9·11”忧郁症缠绕,以“反恐”为名制造了更多暴力。而个体通过重返归零地,得以进行一种去媒介化的历史哀悼,清算丧失并内化他者。这不仅关乎生者对死者的友爱,更预示着新的政治—伦理地平线,“……我们自己的世界,将以一种既有限又无限——道德上说是无限——的方式开启”^⑥。死者站在未知的彼岸吟唱哀歌,而废墟作为历史的残存,显露出逝者与幸存者潜在的联系,更打开了其他关于丧失的历史瞬间,具有抵抗的政治潜能。沃尔特对后“9·11”哀悼的书写不仅描绘了美国社会的忧郁图景,更为重要的是,提供了一个通向美和正义的无限空间。废墟不意味着失语,而是超越哀悼困境的可能。

Post-9/11 Melancholia and Mourning in *The Zero*

CHI Hui-yi & YANG Jin-cai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In *The Zero*, Jess Walter's writing on the post-9/11 collective mourning ironically portrays a melancholic picture of American society to examine its political and ethical practice, and moreover, to envision a self-reflexive historical mourning. Two kinds of loss narratives, the politically idealized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and mourning spectacles produced by mass media especially the TV, define the mediated mainstream mourning and help produce melancholic subjects to serve the state of exception and commercial expansion. As a result, citizens constructed by melancholic discourse fail to reflect upon "loss" and gradually forget their authentic emotions towards the event. However, the self has the potential of emancipation from power control. With dis-mediated historical mourning of the ruins "Zero", individual is empowered to generate authentic feelings with imaginations and memories and to contemplate upon violent moments in history.

Key words: *The Zero*; Jess Walter; mourning; melancholia; ruins

(责任校对 莫秀珍)

①Walter, Jess. *The Zero*.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6, p. 310.

②瓦尔特·本雅明:《启迪:本雅明文选》,张旭东、王斑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269页。

③Walter, Jess. *The Zero*.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6, p. 303.

④Walter, Jess. *The Zero*.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6, p. 302.

⑤Walter, Jess. *The Zero*.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6, p. 148.

⑥Derrida, Jacques. *The Work of Mourning*. Pascale-Anne Brault and Michael Naas, eds.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p. 107.